

黄新华 李松霖

摘要:深化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人民群众的公共服务获得感、公平感和幸福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应有之义。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看,深化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需要,也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需要。当前,公共服务供给侧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能适应公共服务需求变化造成供给总量不足、分布不均、质量低下,主要表现在供给主体失衡、供需匹配失衡、供给城乡失衡以及供给人群失衡等方面。深化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权利和利益的再分配,必须理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精准识别需求匹配供需关系,统筹城乡发展,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一体化和均等化。

关键词: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构性问题;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 C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804(2019)02-0051-08

公共服务是为满足公共需求和实现公共利益向社会提供的各种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①当前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群众对医疗、养老、住房、交通、教育等还有诸多不满意的地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角度强调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③。深化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通过改革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人民群众的公共服务获得感、公平感

作者简介:黄新华,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李松霖,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361005。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国家经济治理政策变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16BJL078)成果。

① 黄新华:《从公共物品到公共服务——概念嬗变中学科研究视角的转变》,《学习论坛》2014年第12期。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③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强调 深入扎实抓好改革落实工作 盯着抓反复抓直到抓出成效》,《人民日报》2016年2月24日。

和幸福感。本文探讨深化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厘清公共服务供给侧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分析深化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阐明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

一、为什么要深化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构”,既包含资源配置与体制机制的结构^①,又意指产业比例结构、行业比例结构、区域结构等各种比例关系^②。落到公共服务供给上,就是政府供给、配置公共服务的体制机制和方式以及政府与各个服务供给主体之间的比例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③当前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供给分布不均、供给质量不高的问题^④,就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的体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改革不合理的体制机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优化供给主体之间的比例关系,提升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对需求的适应性与灵活性,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公共服务需求。

从国家层面看,深化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⑤从结构上看,国家治理体系是一整套国家制度的统一。深化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公共服务供给的体制机制与供给主体的比例关系,本质上是对我国公共服务供给和分配制度的优化与调整,有助于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及社会、城市与农村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关系与责任,促进公共服务供给权责协调统一。更进一步说,解决公共问题、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是国家治理的逻辑起点。^⑥在公共服务视角下,国家治理能力体现为公共服务的供给与分配能力。以多元主体参与提升供给总量,以精准回应需求优化供给质量,以多种政策工具提高供给效率,以变革供给制度实现分配公平,将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从社会层面看,深化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需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必须解决谁来共建、如何共治、怎样共享的问题,从公共服务供给的角度来看,必须整合供给资源、优化供给机制以及完善分配机制。这是因为政府资源在“量”和“质”的维度

① 吴敬琏:《把握结构性改革,先从六个方面突破》,《新华日报》2017年2月23日。

② 黄群慧:《论中国工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9期。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④ 杨宜勇、邢伟:《公共服务体系的供给侧改革研究》,《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5期。

⑤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

⑥ 薛澜、张帆、武沐瑶:《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研究:回顾与前瞻》,《公共管理学报》2015年第12期。

上通常难以满足社会多元的公共服务需求,需要整合市场与社会等多元主体在资金、技术、智力、人力等资源上的优势,化供给分力为合力,在提升多元主体参与度同时,增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深化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单一由政府体制或政府-市场二元体制外,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可以为多元主体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提供有效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当前我国公共服务供给存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人群之间的差异,由服务供给形成的社会不平等与剥夺感,容易激化社会矛盾。深化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公共资源和利益的再分配,为共享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奠定了基础。

从个人层面看,深化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需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在结构和内容上出现了新变化。从结构上看,公共服务需求由生存型、享受型向发展型迈进,在物质生活改善后,人民期待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从内容上看,服务需求由单一向多元,由大众化向个性化发展。深化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精准地识别需求,因地制宜地满足需求。但是,与此同时应当看到,目前公共服务供给依然存在供给总量不足、分布不均、质量低下等问题,这些问题增加了个人的生存成本与生活风险。深化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升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在做大增量的同时盘活存量,纾解城乡、地区、人群之间的公共服务供给差异,有助于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公平感和幸福感。

二、公共服务供给侧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公共服务供给侧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是指因体制机制阻塞、资源配置扭曲以及供给主体之间的比例关系失衡,公共服务供给不能适应公共服务需求变化,进而形成供给总量不足、分布不均、质量低下现象,主要表现在供给主体失衡、供需匹配失衡、供给城乡失衡以及供给人群失衡等方面。

一是供给主体失衡。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主要由政府、市场及社会组织构成。市场与社会组织作为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其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在由服务提供者(政府)、服务消费者(公众)、服务生产者(市场与社会组织)、服务评估者(第三方机构)组成的公共服务供给环节中^①,政府依然处于中心地位。即便是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政策推行以后,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的公共服务也主要集中在社区服务、行业性服务、行政事务三个领域。在劳动就业、卫生计生、残疾人公共服务等领域中,社会组织的影响力较小。换言之,在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受到财政约束的状况下,社会资本的作用未充分发挥。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失衡,很大程度是由于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梳理不清,缺乏明确的公共服务供给责任清单。虽然“十三五”规划界定了政府供给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但政府、市场与社会在公共服务供给上的责任与角色的认定仍存在较大弹性,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缺乏广度与深度,政府向社会组织购

^① 王浦劬等:《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发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9页。

买公共服务体现出反向嵌入性特征,名义上政府与社会分离,但实质上仍然保持政府对社会的直接控制^①,政府与社会组织实质上仍然是不平等的依赖关系^②。

二是供需匹配失衡。明确地表达和实现公共利益是政府存在的理由之一。^③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促进公共服务供需匹配,是实现公共利益的必要途径。所谓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指的是用于公共服务的社会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公共服务高效、优质、准确地输送给需求者。^④公共服务的供需错配表现在有效供给不足、低效供给过剩的同时,公共服务供给精准度低,需求回应性差。供给主要是政府向公众的单向传递,如果缺乏公众参与,公众的需求就得不到有效识别与满足。公共服务供需匹配失衡在于公共服务需求揭示机制不完善,供给对需求的认知存在信息不对称。精准的需求揭示是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前提,公众的需求与偏好如果得不到表达或不被决策部门采纳,公共服务供给极有可能与公众的需求相背离。但是在公共服务需求揭示中,存在基于成本约束而减少需求采集,导致需求偏好得不到充分揭示的现象,也存在采集需求偏好过程中,对真实的需求偏好进行选择性与选择性吸纳现象,此外,财政资金是用于生产还是用于民生,取决于它对有配置资金权力官员的相对效用水平。^⑤在晋升锦标赛的激励下,能够直接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桥梁等经济性公共服务往往更受到政府青睐,而回报周期长、见效慢的基础教育、卫生医疗等社会性公共服务则有可能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从而导致经济性公共服务过剩,而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此外,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企业为了满足自身利益可能会对决策者进行俘获,诱使其将公共资源投入到偏离群众需求的领域,致使公共服务供给的民众体验感差,公共服务决策因寻租而偏离公共需求。

三是供给城乡失衡。在户籍制度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城市与乡村在医疗卫生、义务教育、社会保险、基础设施建设等各方面存在明显的供给差异。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下,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以城市为中心,重城轻乡的取向明显。这种社会治理导致公共服务供给将我国公民分成社会和经济地位截然不同的两类人,在户籍制度的约束下,农村居民即使进入城市也无法和城市居民享受同样权利,城乡居民在收入、消费、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诸多差距。为了维持城市生活秩序与社会稳定,政府投入了数额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质量与农村相比存在天壤之别,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整体相当薄弱,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在二元结构的社会治理体制中进一步强化。^⑥城乡供给失衡缘起于计划经济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政策和城乡分割的社会政策(户籍制度),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制度、统购统销制度、农业合作化制度确保了农业对工业、农村对城市长期、巨大的贡献。^⑦这样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对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产生两方面影响。从供给能力看,农村财政能力弱化,城市财政能力增强,城市在掌握更多资源的背景下所提供的医疗、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能力显著提高,而缺乏财政支持的农村,其配

① 管兵:《竞争性与反向嵌入性: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组织发展》,《公共管理学报》2015年第3期。

② 吕纳:《公共服务购买中政府制度逻辑与行动策略研究》,《公共行政评论》2016年第4期。

③ [美]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丁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2页。

④ 陈振明、李德国:《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与有效供给》,《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1期。

⑤ 郭庆旺等:《中国分税制:问题与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页。

⑥ 黄新华、黄培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路径选择》,《东南学术》2013年第4期。

⑦ 白永秀:《中国城乡发展一体化:历时考察、理论演进与战略推进》,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4页。

置公共服务的能力则不断削弱。从供给水平看,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人为造成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分割,在城市与农村负担人口相对不变条件下,城市财政资源越发充裕而农村财政资源愈发匮乏,城市与农村公共供给服务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城乡二元分割现象。

四是供给人群失衡。供给人群失衡主要体现在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所享受公共服务的不均等性。2016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5亿人,占总人口的17.7%,相当于每六个人中有一个是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平均居留时间(年)持续上升,由2011年的4.8年升至2016年的5.7年。与此同时,家庭化流动趋势明显,家庭户平均规模保持在2.5人以上,2人及以上的流动人口家庭户占81.8%以上,在流入地生育、就医、养老的比例不断上升,对相关公共服务需求持续增长。^①但由于户籍制度制约以及地方政府接纳积极性的限制,流动人口在就业培训、社会保障以及子女教育等领域无法同户籍人口平等地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即使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在同一名目下享受公共服务,二者所享受的数量与质量也存在较大差别。供给人群失衡缘起于户籍与财政的制度设计缺陷。从户籍制度看,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人为地进行身份标识,为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平等享受公共服务设立了制度壁垒。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的主体,为流动人口平等提供公共服务势必应与财政收支形成激励相容。从财政支出看,由于流动人口不拥有流入地户籍,为流动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将形成财政支出的外部性。对2005~2013年转移支付与人口流动匹配检验发现,大量流入的流动人口并未给流入地带来相应的转移支付,转移支付不能“随人而动”的状况扭曲了地方政府在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财政激励。^②换言之,财政支出的外部性无法通过转移支付得到有效矫正,在财政支出上地方政府缺乏向流动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的动力。从财政收入看,地方政府收入来源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间接税与流动人口的居住、消费关联度较弱^③,即使流入人口的生活消费为流入地产生税收贡献,但仍有可能不抵城市中高昂的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因此流入地政府缺乏相应的财政收入激励。

公共服务供给侧存在的结构性问题,阻碍了人民获得感、公平感和幸福感的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将更加注重公平公正,在做大做强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让百姓有更多成就感和获得感。”^④公共服务供给侧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表明,公共服务这块大蛋糕分配不均,人民群众的付出与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不完全相适应,付出与回报的落差阻碍了获得感、公平感和幸福感的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构性失衡,在为资源洼地吸引更多资本与劳动力要素涌入的同时,极易出现服务超载,形成新的供需矛盾,并对供给不足地区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造成挤压,引发社会矛盾。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缺乏对需求的精准回应,导致公共服务的供需错配,造成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不足,低效供给过剩,而公共资源的浪费则降低了财政使用效率,加剧了公共服务供需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的目的是造福人民,“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

①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中国人口出版社,2017年,第3~8页。

② 甘行琼、刘大帅、胡朋飞:《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地方政府财政激励实证研究》,《财贸经济》2015年第10期。

③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中国人口出版社,2015年,第13页。

④ 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6年9月4日。

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①。落实到公共服务上,就是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公平感和幸福感。

三、深化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

深化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人民群众享受公共服务供给的获得感、公平感和幸福感,必须理顺资源配置机制及供给比例关系,发挥好政府、市场与社会在公共服务供给上的比较优势,形成一个开放平等高效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一是厘清主体关系,发挥多元主体作用。公共服务供给的基本问题是:提供什么,提供多少,如何提供。其中,如何提供公共服务,即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与方式是公共经济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从总体上看,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机制与方式有两类:政府供给与市场供给。某一服务适用于何种供给方式,不仅要考虑该服务的性质与特征,更要考虑成本与收益、效率与公平等问题。一般而言,对于受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公共服务,主要由政府供给,但是由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局限,政府供给方式会出现失效。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增长,政府财政支出的压力越来越大,同时由政府垄断公共服务的供给,也会产生一些制度性缺陷,造成供给质量低劣、供给过剩或错位等问题。在市场供给环境中,公共服务的生产者是私人企业或社会组织,它们以营利为目的提供公共服务。消费者通过“用足投票”表示自己对该服务的满意度。在此情况下,政府在交易中的介入程度并不深,主要是确定服务并制定安全和其他标准。在市场供给方式中,存在多个利益相关者,竞争机制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公共服务的市场供给包括以下几类:合同承包、特许经营、用者付费、内部市场、补助、凭单等。但是由于市场主体存在“理性经济人”的风险,政府以市场方式提供公共服务未必一定带来服务成本的下降,因此政府向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时应加强合同管理与监督能力,但是过于严密的合同未必能带来服务效率的提升^②,当市场主体不能从正式制度中寻求解决问题的空间时,往往会转向非正式制度,进而造成效率损失。因此合同缔结既要保证原则性,又要留出一些合理的弹性空间。对服务生产者的监督不应仅由政府完成,还应委托专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服务外包的绩效进行专业化测评,引入公众满意度机制,保障服务使用者的感受得到表达。更为重要的是,理顺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边界,不仅需要明确各主体的供给责任,还需要保障服务承接主体的独立性,使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形成平等的契约关系,否则便会形成政府控制下的虚假市场,造成“供给方缺陷”^③。

二是精准识别需求,匹配供需关系。提高公共服务供需匹配水平,应将制度完善与技术创新相结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互联网+公共服务”建设,构建平等、开放参与的需求表达体系。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② 刘波、李娜、彭瑾等:《环卫服务外包中的正式契约、关系契约与外包效果——以深圳市为例》,《公共行政评论》2016年第4期。

③ [美]唐纳德·凯特尔:《权力共享:公共治理与私人市场》,孙迎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第一,完善公共服务需求识别机制,在保障政务公开制度、听证会制度、政府信箱等机制畅通,落实各级人大代表职责的同时,应积极利用互联网平台,重视自媒体的传播作用,拓宽民众表达需求的途径,运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采集民众在该区域所产生的交通、消费、医疗、教育数据,勾勒辖区民众的用户画像,精准回应民众需求。第二,提高民众参与程度。民众参与公共服务供给不仅体现在需求表达权上,还体现在对服务的选择权以及服务评价权上。应重视公民对公共服务承接主体的选择,积极构建满意度评价体系,提高民众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参与度。第三,强化信息整合的共享能力。民众向政府表达的需求往往是碎片化的,应强化对部门所掌握信息的整合与管理,积极利用“互联网+”模式与大数据平台,在数据收集与数据分析等方面做到及时、有效,建立统一的部门信息平台,完善类别信息借调程序,实现公共服务需求信息共享。第四,加强对公共服务决策过程的监督。一方面要加强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职责,另一方面要吸纳多元监督主体,拓宽监督渠道,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共服务质量评估体系,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是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改变和摒弃重城市、轻农村,城乡分治的传统观念和做法,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清除城乡之间的樊篱,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把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综合起来解决,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一体的协调发展。为此,必须实现观念、体制、机制的全面变革。第一,树立城乡一体化的理念,逐步推行城乡规划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第二,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改变城市偏向型的财政供给体制,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形成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财政支撑体系,缩小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差距。第三,深化地方行政体制改革,总结“省管县”的有益经验,缩小县乡的管理层级,提高县乡的财政效率和管理效率,加强省级政府对县乡政府的财政监督,保障经济性公共服务与社会性公共服务的合理比例。第四,加强城市反哺农村力度,提高城市在人才、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方面对农村的支持力度,提高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第五,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技术创新能力,利用无人机物流、农村电子商务平台、网络云课堂等技术,降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边际成本,增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四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进入城市的农民难以在城市立足,这些户口在农村的城市务工人员(流动人口)难以获得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这种不平等的对待是一种身份歧视,而且被城市社会排斥的感觉也阻碍城市务工人员融入主流社会的步伐,容易诱发不同程度的认同危机和心理危机。因此,必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将流动人口逐步纳入统一的市民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系统之中,实现城乡居民间的户籍平等和身份平等,消解城乡分割的制度性壁垒,逐步取消户籍背后的利益附着,完善户籍改革所需的住房、就业、教育等配套资源,切实保障转户群众的合法利益。考虑到户籍制度改革的复杂性,可以先通过流动人口的居住证制度的优化,为户籍制度改革探索道路。居住证的制度设计应考虑两个维度的平等:获取居住证的机会平等,基于居所享受实际权益的平等。^①应充分考虑不同人群的能力差异与工作实际,将居住证区分为多种类型,满足不

^① 杨菊花:《浅议居住证暂行条例与户籍制度改革——兼论居住证与新型城镇化》,《东岳论丛》2017年第3期。

同人群申请需求,消解确有需求的人群申请的制度壁垒。虽然居住证制度保障了流动人口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但持证群体极易被人为区隔,其与户籍人口所享受的公共服务同名不同质,因此必须消除寄宿在居住证上的身份区隔,缩小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福利差距,减少甚至取消福利梯度,保障人群间福利的相对公平,进而促进各要素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平等地流动,最终为户籍制度的改革创造条件。

四、余论

深化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权利和利益的调整与再分配,其所解决的不仅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群之间所获得的公共服务的优劣多寡所带来的公平问题,更是人与人之间能否平等发展的发展权问题。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的应有之义。因此,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公平感和幸福感,使其公平享受到与之付出相适应的公共服务,是检验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的标准。公共服务所包含的公共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社会服务、住房保障、文化体育以及残疾人服务等,蕴含的终极价值追求是促进人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深化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需要资源配置机制的创新,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扩大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规模,更需要从体制机制改革出发,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和统筹城乡发展,以发展的增量改革优化利益的存量,最终实现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与水平的提高。深化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认识到地区间服务需求的差异性,在改革过程中要重视制度设计的灵活性,从而保障改革平稳顺利进行。

责任编辑:汪立峰

Review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in China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Li Juan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has developed synchronously with the whole hist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Forty years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have shown us that market mechanis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target responsibility system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public participation i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is the exogenous motive for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In the new era, we need to handle the three pairs of relations, overall promotion and key breakthroughs, vertical management and unified supervision, ecological system and ecological culture.

Key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historical process; basic experience; future outlook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Pursuing Progress while Ensuring Stability" and the Implication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Xiao Xiao

Abstract: The connotation of "pursuing progress while ensuring stability" has undergone a long process of change and development. Its essence lies in the mutual adaptation and coordinated transformation among productive forces,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superstructure. The core is to maintain the dynamic balance within the economic structure. The basic requirement is to achieve the unity of following the law of realistic development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human beings in economic work.

Keywords: "pursuing progress while ensuring stability"; connotatio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implication

On Deepening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Public Service

Huang Xinhua, Li Songlin

Abstract: Deepening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public services and promoting people's sense of fulfillment, fairness and happiness in public services is the proper meaning of acting on the vision of making development people-cente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social and individual, deepening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public services is the need to modernize China's system and capacity for governance, establish a social governance model based on collaboration, participation, and common interests, and meet the needs of the people's aspirations to live a better life. The essence of deepening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public services is the redistribution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Keywords: public servic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structural problems; path selection

How to Achieve Employment Balance between the Real Economy and the Fictitious Economy

Li Biao, Meng Dahu

Abstract: The employment between the real economy and the fictitious economy in our country shows a significant imbalance,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wage level between the two sectors, the widening gap in the growth rate of labor supply, and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industry returns and the quality of employees. In view of this, we should actively play the macro-control role of our government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and strive to achieve employment balance in the labor market.

Keywords: employment balance; real economy; fictitious economy; productive sector; rent-seeking sector

Marxist Jurisprudence in the Context of Revolution: An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Leftist Social Science of Law from 1927 to 1937 in China

Zhang Xiaojun

Abstract: After the defeat of the first great revolution, lawyers around 1930s of left-wings, rallied round Chi-